



法国短片《好孩子坏孩子》剧照

【新书序言】

《躲藏起来的孩子》是台湾大学中文系周志文教授多年撰写的教育散文选集。书中从《躲藏起来的孩子》一文延伸,以作者的个人成长、育儿以及教书育人的经历为出发点,叙述作者与长辈、朋友、女儿、学生等三代人之间动人的青春与成长故事,探讨教育与自我救赎、亲子关系、艺术审美等论题。作者认为,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也没有一个成人是可以被放弃的,期待每个孩子、每一个成人都可以不再躲藏,为迷茫的人提供一种思考方式,给清醒的人展示一种教育经验。

明暗之间的生命记忆

□唐小兵

年初,台湾大学中文系周志文教授多年前一篇刊发于台湾报章的旧文《躲藏起来的孩子》在大陆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我也因此而得以读到。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讲述其第一个女儿球球缓慢生长的成长故事,充满了来自学校、社会和教师的比较晦暗的生命记忆,以及作为父母是如何细心等待其长成的心路历程,对照大陆愈演愈烈的精英教育和应试教育(其实质就是一种只承认强者、胜利者而漠视失败者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和价值观,培养出来的个体大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格往往只会将同学、同事和同

车子为例,有的车子开得快,因为要负重,有的开得快,设计为跑车,但不能用来负重,各有特色,我们世界多元,其实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慢车比较更有些,尤其路况不很好的地方。用欣赏的方式看周围的人吧,尤其是自己的孩子,有时要伸出援手,是给他信心,慢一点走,走得稳是好事。我是个急性的人,我对子女也有过苛的地方,一次我做梦责罚我的小女儿,她顶嘴我打了她一记耳光,想不到出力太大,我把她打死了,我大声呼叫号啕,被睡在旁边的内人摇醒,啊,多幸福呀,只是个噩梦,我便不再打骂孩子了。”这段话对苦恼于孩子教育问题的我也如同一剂清醒药。是啊,走得慢才能走得远,为什么我们总要做茧自缚急功近利而庸人自扰呢?现代人对子女教育乃至人生成功的焦虑,又有多少是真正关切孩子的生命之完整与精神之成长呢?

周先生少年时代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甚至被母亲和教师经常体罚,也留过级,因此,他对于教育史上的失踪者的足迹与心灵史有一份痛彻于心而不忍无视的关切,也正是由此触发,他对于优等生文化更有一份深切的思考:“我们在教育的观念上还太‘单元’化,认为书读得好的人是好学生,书读得好的又以理工科成绩好的最受看重,因为他们未来的‘出路’更好。其实社会是个综合体,跟人完全一样,所谓健康,不专指筋肉,骨骼筋肉与精神的发展同样重要,每件器官在人身上都贡献,没有谁重要谁次要的问题。”

这种多元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平等主义的自我意识,是当今中国稀缺的一种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跟随周先生的笔触去重温一个“不良少年”的成长史,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家长,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直接地说,我们所习惯去了解的往往是功成名就者的辉煌过去所蕴藏的成功经验,但其实那些具有创痛感甚至屈辱感的生命经验,若能正确审视与检讨,也能成为生命世界中意义的源泉。

讲述往昔生命中的“黑暗体验”,并将之转化为一种具有共通性的成长契机,这是周先生写作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最重要的一种文化自觉,而这种视角与意识恰恰是我们的阅读世界中相对匮乏的。

周先生的少年时期经历了家庭的暴力、学校的暴力、留级的屈辱、教官的羞辱等各种难以言述的苦闷,稍有差池就几乎陷溺在难以自拔的沉沦之中,但幸亏一些偶然的机缘与自我的韧性,终于从偏离的轨道中又慢慢走回来。可以说,他的一生走了很多弯路或者用如今的话说就是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在世人的眼里,弯路和错误都是不必要的对生命的浪费,成长就应该是奔着一个“高大上”的目标经过精心计算的理性和有效的工具努力抵达的过程,这中间不能容许任何的差池和失误,更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分心。而在周先生的生命经验中,这种价值观显然是大有问题的,而那些黑暗的体验经过适当转化也可以成为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换言之,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失败,关键是如何去理解失败与人生意义之开阔的关系。

【他山之石】

造物为荣： 从社会刚需 到精神信仰

□禾刀

作为一部打撈日本工匠精神的读物,本书从日本职人历史发展、培养制度、文化信仰、技术传承等方面的深刻讲述,到12位现代“匠人”与12种古老而不朽的手工艺的详尽介绍,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严格与欢乐同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职人世界。

日本职人文化“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源头应自江户时代。江户时期的日本职人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宽永元年(1624),在德川政权日益巩固之际,为营造日光东照宫,集中了全国大量的职人”。权力顶层的需求往往伴随着严苛的质量惩戒机制,全世界的宫廷建设莫不如此,职人无不是提着脑袋使出吃奶的看家本领,精益求精;二是频繁的重建,刺激了社会对职人的旺盛需求。日本房屋普遍采用木质结构,防火能力差,加之日本位于地震多发带,所以受火灾和地震损毁等原因,重建对职人有着大量刚性需求,职人从中自然会得到大量锻炼机会;三是职人扎堆产生的聚合效应。当大量职人聚集在一起时,不管是否愿意,竞争必然愈趋激烈,倒逼职人技术不断进步乃顺理成章。

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门槛很高,所有职人必须从师傅那里取得“鉴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职人,常常先得师傅“面试”,然后经过长达数年的耳提面命和严格考核。职人之所以能够忍受物质上的低回报,主要是因精神层面得到权力的认可。“鉴札”就像是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一张极为特别的“驾驶证”。发放鉴札的要求越严,历经数度寒暑终于“出师”的职人便越有成就感,加之“幕府时代以来,(地方)曾经数度发出无鉴札者不得被雇佣的公告”,这既是对职人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寓意权力对职人社会地位的认可,自然会进一步推高职人的成就感。当精神激励远甚于物质激励,“造物为荣”自然蔚成风气,至而化为社会惯性认知。

本书介绍了日本12种古老的手工艺,每个行业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特色。日本对传统手工艺和职人的鼓励主要依托“人间国宝”和“现代工匠”制度,前者倾向于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推广,一旦被认定,常常会得到政府一定资金援助。后者侧重于职人本体的精神表彰。

虽然日本职人精神可上溯至江户时代,但有段时间,日本制造里却难以寻觅职人精神痕迹。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急欲振兴工业,无奈产品质量堪忧,一度成了劣质的代名词。令人费解的是,本书对此段历史并未认真挖掘,不知是否因为改变这一现状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著名的质量管理大师,来自美国的戴明博士。

就是这个被业界称为美国“弃儿”的戴明博士,其推出的“质量管理十四法”,以及“戴明环”,帮助日本产品质量打了翻身仗。在戴明的带动下,日本企业创造了全面质量控制(TQC)等为国外企业争相学习推广的质量管理新法,涌现了石川馨、田口玄一等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质量管理专家。

职人在日本的推崇离不开制度推手。一方面他们“仿效德国‘我的明星’制度”,制定了涉及金属、机械、电子、建筑、园艺、裁剪等多个方面的国家技能检查测定制度,让职人技艺标准显性化刚性化;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评比“日本造物大奖”和“有活力的300家中小企业”活动,既“表彰那些对工作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的团体或个人的发明”,也奖励那些“秉承了江户时代以来的‘造物’精神的传统企业”。

沐浴在这样浓厚的“造物为荣”文化气息中,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敬业著称的“职人气质”。有调查表明“日本职员的努力是常人的一倍以上”,日本职员的敬业度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日本职人“造物为荣”理念,已从江户时代的社会刚需升华到今天的精神信仰,这不是简单的时间积累,而是日本在岁月长河中对职人持之以恒推崇结晶而成的传统文化。从这层意义上讲,树立工匠精神,只有始终如一,深耕不辍,才能水滴穿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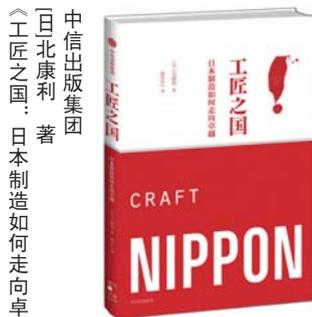
周志文 著
《躲藏起来的孩子》

我常常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应给受教育者知识,这些知识应该是教导孩子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教育应该想办法造就一个人,而不是摧毁一个人,至少使他自得、使他快乐,而不是使他迷失,使他悲伤。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朝这方面进行呢?答案是正反都有。我们的教育,让“正常的”、成绩好的学生得到鼓舞,使他们自信饱满,却使一些被视为“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学生受到屈辱,让他们的自信荡然无存。凭良心讲,那些被轻视的“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孩子比一般孩子是更需要教导,更需要关心的。然而我们的教育,却往往把这群更需要教育的孩子狠心地抛弃,不加任何眷顾。

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这一点家长和孩子都要记得,在教育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受教育的人是该被放弃的。父母放弃子女是错的,教师放弃学生是错的,而孩子本人,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

孔子尊崇有教无类,西方人强调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可这些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世俗社会中往往证明了“善的脆弱性”,这个时代的精英并没有将教育者应该成为点亮每个孩子内心之光的燃灯者的理念,切实地在日常教育的场景与细节之中贯彻,我们似乎都只喜欢优秀而听话的好孩子,也就是无个性而只会刷题和配合学校的尖子生,这种观念和方式导致的就是社会和教育领域的高度单一化和扁平化,没有多元的碰撞和自由的生长,最后所形成的往往仅仅是一些欠缺内在灵魂的势利而孤独的成功者。长大成人以后,大多数往往就是韦伯所言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周先生在三月份与我通信谈及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时如此写道:“我们爱一个人,是爱他整个,不是单爱他的优点,当然有些缺点要改正,可是研究遗传学的人都知道,要改的如是天性,便会很慢。我觉得大都市里的好学校,都太重视效率了,对孩子造成压力,有时没有激发孩子潜能,反而害了他。举



中信出版集团
【匠人之国】日本制造如何走向卓越
【匠人之国】日本制造如何走向卓越